

天府文化的源流梳理和当代表达

◎ 文 / 谭平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讲好成都故事，重塑精神标识，打造属于成都自己的经典文化符号，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成都形象。”

这是日前成都市在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会发出的声音。

这无疑找准了走向世界文化名城的根本路径。古往今来，成都这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积累沉淀了丰厚的既属于中国、也属于自己，还具有跨文化、跨语言传播活力的历史文化资源，只有这些资源和财富，能够广泛进入成都市民的记忆和内心深处，其优秀禀赋与个性，能够得到认知和传承，成都市的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之路，才能有深厚的根基和持续的动力。所以本文从纵向的角度阐述天府文化的源流及其当代表达。

位于地球黄金纬度、中国三条丝绸之路最佳参与位置的天府成都，具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孕育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成为成都古今保持充沛活力和优越个性的力量源泉。天府文化的活水之源，应该表达为独一无二的水利、平和温润的气候、丰富齐备的物产、立体多彩的环境、流播均衡的三教、吐故纳新的丝路、天南海北的移民、从未更改的城名。这“八源”，要么成都独有，要么成都优势明显。所以，它能够从东汉后期开始，成为无可争议的天府乐土，成为今日学者口中的“中国后花园”，拥有改革开放后自然天成的“后现代气质”（即一座城市同时具备健康的经济、活跃的文化、舒适的生活），成为新兴的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文化名城。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天府文化四个孕育发展和呈现的高潮具有如下内涵。

孕育期：古蜀王国

古蜀王国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追求更加美好、安宁生活为动力，先民们以治水为主线，从山地走向平原，从流徙走向定居，经济活动从游牧走向农耕，精神活动从粗放走向优雅，生活方式从简朴走向精致，体现天人合一、神人合一、蜀夏合一之趋向。蜀族、蜀王国从独立发展走向吸纳华夏文明和楚、滇文化之优长，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融入黄河、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之中。《山海经》《华阳国志》《蜀王本纪》《左传》《古史》等经典和历代诗歌给我们留下的是神秘、浪漫的历史记忆，三星堆、金沙遗址以及其它考古



都江堰水利工程，为天府之国的长盛不衰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掘才比较清晰地揭示出古蜀王国时期基于上述背景的强大创新创造能力和个性鲜明的优雅时尚、乐观开明。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入选中国文化遗产标识正是对上述判断的最好注释。这一时期是天府文化的孕育期。

定型期：秦汉时期

秦汉王朝的列备五都，代言中华。公元前316年，蜀国纳入了秦的政治版图，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第一次大一统的必经步骤。张仪、张若奠基了成都永不更名、永不改变中心城区的基础，仿首都咸阳形制修筑的成都城，规模宏壮。伴随大量秦人移民成都，“染秦化”实现的文化交融，尤其是继二张之后李冰来到成都，在继承弘扬大禹、鳖灵治水的基础上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天府之国长盛不衰的经济基础。秦汉之

际，成都相对比较平安，留下比较好的发展基础。文翁治蜀，举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官学，儒家文化迅速传播，人文教化比肩齐鲁，奠定天府之国作为中华文化重镇和人类文明版图上耀眼星城的文化基础。

这一时期，成都是中国五大都市之一，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外贸活跃，对中国和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蜀布、邛杖代表中国制造首次出现在国际市场，也证明了成都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创之功；火井煮盐，是人类最早使用天然气；《方言》成为世界上首部方言题材专著；王褒《僮约》显示，成都是世界茶文化起源地。司马相如、扬雄用壮美汉赋代言、彰扬大汉声威；在新疆出土的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不仅证明蜀锦是丝绸之路上的极品，而且表达了成都官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著名的

石雕击鼓说唱俑证明了成都在东汉丰富快乐的都市文艺生活。佛学、佛教于东汉后期从古印度来到中国，也来到或往返成都，道教汉末出现在成都平原，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精神家园丰富完善的重要内涵。东汉后期，成都平原正式取代关中平原，成为中国经济和人文地理版图中的天府之国。这一时期是天府文化的定型期。以刘备、诸葛亮作为符号的蜀汉历史文化以及三国文化，可以视为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与成都文化相互交融的悲壮余响。

巅峰期：唐宋王朝

唐宋帝国的喧然名都、大雅殿堂。继隋朝亲王杨秀扩建城池，成都号称“既崇且丽”以后，在唐朝富有活力的制度和世界领袖国家的宽广怀抱里，在两宋领先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土壤上，在国家高度佑文气质的呵护下，天府成都涌现了大量世界或中国第一以及各种突出成就。包括成都成为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的诞生地（或之一）；涌现了“龙池坊卞家”——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宋太祖下诏在成都印刷的《开宝藏》，是我国及世界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而宋仁宗时期官方发行的交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唐朝成都雷氏家族生产的雷琴，成为古琴的极品、翘楚；成都在唐朝出现的杂剧是我国最早的成型戏剧；大慈寺，是中国唐五代时期最盛大的佛教艺术殿堂；后蜀官方刊刻的“蜀石经”，成为儒家经典传播中前无古人的重要创举；宋代成都人唐慎微撰写的《证类本草》，是中国流行、使用时间最长的药典；后蜀孟昶之“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成为中国第一幅对联，五代后期黄筌父

子开创的宫廷花鸟画派，影响中国花坛一个世纪以上。

至于唐朝“扬一益二”和宋朝“西南大都会”显示的成都的卓越城市形象，以及以今日杜甫草堂、望江公园、崇州罨画池为代表的成都在唐宋诗词、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天下诗人、词人与成都的紧密联系，都是这一时期成都成为中国大雅殿堂、影响及于海内外的生动诠释。唐宋之间，前、后蜀战乱较少，留下诸如王建墓（永陵）之浮雕“二十四伎乐”，神形兼备，精美绝伦，生动地再现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舞场面，是我国五代石刻的经典之作和研究古代乐舞的极宝贵资料。而孟氏后蜀，除了重视文教，刊刻儒家经典，因为喜欢芙蓉而下令在成都遍植芙蓉外，还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影响堪称最大的一副官箴，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在宋代，因为皇帝推崇、大书法家黄庭坚亲笔书写后，流传很广，成为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史中的著名篇章。

唐宋时期，尤其是两宋，因为国家轴心文化与巴蜀文化、天府文化实现了历史上最佳的耦合与互动，加上两宋始终在北方面临严重的外部挑战与威胁，版图逐步萎缩，以成都为重心的四川的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朝廷对成都、四川的治理格外关注，国家治蜀政策也多关心、体恤，所派官员多一流清廉、实干人物和努力为国家发现、举荐、重用人才的伯乐，他们还不遗余力，把成都府学办成了中国第一，如南宋历史学家李心传所言：“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成都的书院如蒲江鹤山书院，藏书达十万卷，皇帝亲赐匾额，规模、气象达到宋代书院最高



传统和现代相融合，成都大慈寺文化商业区将打造天府文化传承区。图 / 视觉中国

水准，所以这一时期，成都、四川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出现系列学术、科第方面的名门望族，和众多父子、兄弟联袂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现象。外来士大夫入蜀和成都、四川涌现的大批人才走向全国各地各个层面，在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卓越表现。此外这一时期，成都的都市文化、都市生活异彩纷呈，十二月月有市（多数集商品博览、交易、官民游乐于一体），儒家古老的“与民同乐”理想，在成都通过部分长官把它因势利导成为众多节庆活动，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娱乐、社会心理建构的多种兼容，赋予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古代特色。这一时期因此成为天府文化演变中的巅峰时期。

元明清三朝，成都经历了宋末元初、

明末清初两次原住民几乎全体消失的巨大灾难，整体上处于剧烈跌宕起伏、艰难恢复状态，只是在局部领域、少数人物身上重新达到天府成都历史上的较高水准。晚清民初，近代教育、实业兴起，蜀学、国学人才济济，对成都的近代化事业跟上全国的步伐有重要影响。

传承创新：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步履从容，气质自然天成。

1978年以来的成都，变化天翻地覆。它审时度势，在现代化、国际化的道路上智慧前行，走出了一条能够把传统与现实、未来较好衔接；充分运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实现自身发展进步；保持并优化城市自身文化个性，立足长远找准自身定位，因应现代化、全球化冲击和挑战并成为强者的发展道路。不管是

